

# 直視壓迫：以社會支配論分析《日常對話》

## A Crude Look at Oppression: Analyzing "Small Talk" by Social Dominance Theory

洪筱淇<sup>1</sup>、邱靖惠<sup>2</sup>、陳柏蓉<sup>3</sup>、陳昱瑄<sup>4</sup>、張曉佩<sup>5</sup>

Hsiao-Chi Hung<sup>1</sup>, Ching-Hui Chiou<sup>2</sup>, Bo-Rong Chen<sup>3</sup>, Yu-Hsuan Chen<sup>4</sup>, Hsiao-Pei Chang<sup>5</sup>

### 摘要

社會支配論 (social dominance theory) 認為群體壓迫是系統性的，由社會制度與個人的歧視所驅動，2016年上映的紀錄片《日常對話》(small talk)，由黃惠偵導演透過拍攝日常生活的方式，講述她與母親之間長期存在著隔閡的關係，以及他們因為拍攝所展開的對話，希望能透過紀錄片來達到自己與母親、母親與自我的理解與和解。本文作者認為《日常對話》不僅是敘說導演與母親之間的故事，更鏡映了台灣社會中許多人的生命故事，而這些生命故事長期以來因著台灣主流社會價值觀的評價判斷，而被邊緣化，甚至消音了。因此，作者嘗試以社會支配論的視框來分析紀錄片中所蘊含的性別、性傾向、職業階級等議題，以及壓迫的多元交織性對親子關係所帶來的影響。本文除了分析說明《日常對話》中的壓迫議題之外，也期許助人工作者在和當事人互動的同時，要將視框放大，要看見當事人身處的脈絡，如同透過紀錄片可以看見那個「愛她的伴侶比愛女兒還多的媽媽」，也同時是「被主流文化所壓迫無法出聲的媽媽」。希望藉由與理論的對話，協助人工作者直視壓迫影響個人生命發展與心理健康的動力。

**關鍵詞：**性別、性傾向、社會支配論、壓迫、職業階級

<sup>1</sup>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學士生

<sup>5</sup>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副教授

通訊作者：張曉佩，(403)台中市西區民生路140號，E-mail: hspc@mail.ntcu.edu.tw



## 壹、前言

社會支配論 (social dominance theory) 層層揭開壓迫與特權之網，分析其結構如何形成，不同於以往其他關於偏見、刻板印象與歧視的理論，社會支配論認為日常壓迫要從多個層面分析，才能了解偏見和歧視是如何產生與維持。電影《日常對話》不僅是敘說導演與母親之間的故事，更鏡映了台灣社會中許多人的經驗，而這些生命故事長期以來因著台灣主流社會價值觀的評價判斷，而被邊緣化，甚至消音了。生活中看似日常的言語及行為、伴隨主流制度與價值觀，隱微地交織成巨大的網，覆蓋著我們的社會，有人彷彿置身被窩中安逸，也有人如獵物般遭其纏繞以致難以呼吸，直到網上積滿了淚水我們才得以看清千絲萬縷的傷痕。

社會支配論有助於我們從系統性的角度，理解各個層面交織後帶來的影響 (Pratto et al., 2006)。因此，作者嘗試以社會支配論的視框來分析嵌入生活中的壓迫，並以《日常對話》這部紀錄片進行省思，希望藉由與理論的對話，協助人工作者直視壓迫對個人生命發展的影響。

## 貳、社會支配論之核心要旨與支配強化歷程

根據社會支配論，群體壓迫往往是系統性的，由社會制度與個人的歧視或偏見所驅動，意即社會制度 (如婚姻習俗、階級制度等) 和許多具有權勢的個體，不成比例地分配資源以致壓迫與特權產生，社會支配論尤其聚焦在階級制度的探討 (Lantz et al., 2020; Sidanius et al., 2004)。

Sidanius 等人 (2017) 指出無論一個社會的政府體制、信仰體系、社會經濟的樣貌為何，人們傾向劃分出社會階級制度 (Smith et al., 2010; Winterhalder et al., 2010)，且主要體現在年齡、專制系統 (arbitrary-set system) (如種族、宗教) 以及性別，像是男性與女性擁有不平等的社會與政治權力 (Pratto et al., 2006)。社會支配論認為要從多元面向來解釋階級制度的存在，包括個體的態度與行為、團體的價值體系 (如職業、宗教的規範)，以及系統層次 (如意識型態及社會制度)，皆能對階級制度產生作用，並往階級強化 (hierarchy-enhancing) 或階級削弱 (hierarchy-attenuating) 的方向發展。顧名思義，前者拉大支配群體與從屬群體之權力差距，而後者則是促進平等 (Sidanius et al., 2004, 2017)。舉例而言，制度歧視 (institutional discrimination)，意即支配群體擁有權力、醫療及教育等象徵性資源，而從屬群體被強加或留有負向社會價值 (疾病、危險等) (Pratto et al., 2006)，便強化了階級制度，像是美國歷史中的奴隸制度，無論是支配群體的個體心理因素如白人種族優越之態度或行為，或是職場、聯邦等歧視黑人的律令，都可能了強化白人的支配地位，而黑人則被貼上「犯罪」、「劣等」之汙名化標籤，其福祉與資源長期遭受剝奪。儘管制度已廢除一個世紀，至今仍有黑人遭受壓迫的現象存在。那麼，階級制度為何能夠長期維持，甚至自主強化呢？社會支配論列舉了五項機制，以下將逐一說明：

### 一、自我選擇 (self-selection)

自我選擇是導致階級制度形成與維持的個人層次因素，可藉由社會支配傾



向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來加以解釋。根據Sidanius等人 (2017) 的論點，社會支配傾向是個體無論身處何種位階，對於階級制度維持的傾向程度，亦即對於階級與不公的支持程度。自我選擇顯示人們會選擇符合自身社會支配傾向的角色或團體，並做出符合該角色的行為 (Pratto et al., 2006; Sidanius et al., 2004)，進而使團體規範與階級制度複製與維持。例如大學生被要求在「強化階級類職業」與「削弱階級類職業」做選擇時，發現所選的工作與他們的社會支配傾向相符，高社會支配傾向者多選擇警察、企業家等；低社會支配傾向者則選擇如社工等消弭階級的職業類別 (Sidanius et al., 1996)。

## 二、合法化迷思 (legitimizing myth)

當擁有特權的支配群體，因內團體偏私或為了確保現有的資源，而合理化不公平的制度，漸漸地形塑社會的價值觀、刻板印象及意識型態等，使不同位階之個體或團體共享這些讓歧視合法化的知識和信念，便形成所謂的合法化迷思，常見的種族主義、性別偏見等便是強化階級的合法化迷思 (Sidanius et al., 2006)。從屬群體可能因自我實現預言而在此位階長久駐足，形成自我削弱，舉例而言，原住民長期被屈抑於底層的現象 (江寶釵、羅德仁，2019)，臺灣原住民族近半數人口居住於都會區，而身處在主流社會的都市原住民，幾乎都曾面臨種族歧視的經驗，例如行為表現被要求符合原住民刻板印象或遭受同儕排擠等，導致認同模糊、自我懷疑等心理健康議題的出現 (Ciwang Teyra等人，2022；劉鶴群等人，2021)。

## 三、制度社會化 (institutional socializ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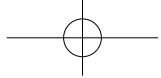
制度社會化是指社會透過建構一套制度來影響在系統中扮演各種社會角色的人們，藉由正式的制度規定、同儕壓力、制度獎勵等微妙但直接的壓力，促使他們做出符合該社會角色的行為、態度和價值觀，最後達到加強和鞏固思想和階級的目的 (Sidanius et al., 2004)。舉例來說，傳統婚姻制度對性別的限制體現於成年女性需要履行嫁人的義務，抑或是當擁有工作的女性沒有兼顧好家庭責任，容易遭到其他女性的責難或指點，強化女性只能透過婚姻與照顧家庭才能證明自我價值，成為達成性別階級差異的工具 (彭思萍，2014)。

## 四、差別報酬 (differential reward)

差別報酬是指若是機構或制度希望個體表現出符合社會角色的行為、態度或價值觀，會獎勵與社會角色相符的行為，反之則會受到懲罰，以維持並複製階級制度 (Sidanius et al., 2004)。以擔任增強階級的職位者為例，即便同一職位者的績效表現一致，若一人表現出與該職位相符的貶低性與壓迫性態度時，則較容易得到升遷機會；反之若表現與職位不符的平等性或一致性態度時，則較難得到升遷機會，也更容易會遭到他人排擠。

## 五、差別耗損 (differential attrition)

差別耗損是指當人們身處與自身社會支配傾向水平不符合的社會角色時，會造成自身的社會支配傾向或社會角色



的耗損，因此個體會透過調整自己的社會角色來符合自己的社會支配傾向水平（Sidanius et al., 2004）。例如高社會支配傾向的大專院校生，若選擇削弱階級的專業科系（如心理學專業），會因為團體中其他個體與自身社會支配傾向差異，以及所扮演的社會角色被期待的態度與價值觀和自身不相符，使自身與環境不相容的感受更為顯著，因此轉而選擇增強階級的科系（如政治專業）。

綜上所述可發現壓迫的發生與內涵是由多元動力所驅動，依社會支配論的立論基礎來看，自我選擇、合法化迷思、制度社會化、差別報酬和差別耗損這五項機制是核心關鍵。

## 參、性別、性傾向與職業階級的支配與壓迫內涵

### 一、性別

張晉芬（2011）認為男性和女性的生理差異在本質上是中立的，但經由社會建構的過程，中立的事實卻成為了對女性的負面限制，成為合理化男性權力和資源的工具，藉以讓性別上的階級差異不斷被強化和維持，進而影響在社會系統下所生活的人們。以下分別從婚姻制度以及家庭地位和家務分工進一步說明。

#### （一）婚姻制度

長久以來男女階級差異的意識形態透過婚姻制度替「男性」和「女性」的社會角色貼上了標籤，並影響在制度下生活的人們。社會支配理論學者認為，男性的社會支配傾向水平往往高於女性，且為不變性的假設，這意味著不論基於年齡、宗教信仰、種族、教育程度、收入多寡等因素，社會支配理論對於性

別的解釋都是不變的（Sidanius et al., 1994；Pratto et al., 2006）。

以繁衍角度審視性別上的不平等，源自於繁殖及生育所需要資源龐大，雌性被認為會尋找具有強大社會和經濟資源的雄性，才可以將這些資源投資於後代，因此為了幫助繁衍，雄性會在經濟資源、社會地位和權力的積累上特別積極。因此女性獲取資源的途徑往往限於婚姻，需要透過婚姻依附於男人才有得到權力的機會，由此可知，性別不平等在本質上大多是父權制的，它給予了男性群體的利益，卻也同時損害了女性作為另一個群體的利益（Pratto et al., 2006；Schmitt & Wirth, 2009）。

父權社會所建構的「男尊女卑」價值觀讓女性在家庭中處於服從的位置，女性要對實現婚姻規範以及扮演其中「好妻子」、「好媽媽」的角色負起龐大的責任與壓力，也必須將自身的需求和職涯選擇視作次要的現象（黃惠君，2012；賴文珍，2012），在社會制度以及文化的要求下，他們被迫被困在名為婚姻的囹圄之中。

另外，華人社會下的集體主義也成為複製父權文化的工具之一，為了維持家庭的和諧與遵從多數人認定合理的觀念，加上社會支配理論認為男性的社會支配傾向程度通常是高於女性的（Pratto et al., 2006），男子氣概主導了男性氣質的展現，而女性也深受樣版角色所限制，所以男性需要透過權力的控制、情感的疏離、性或肢體暴力等行為（賴文珍，2012），來展現支配的主導權，以此強化自身在家庭中的支配地位，而女性需要表現服從和接受並將自身置於家庭中的從屬地位。因此，當男性對女性展現出暴力行為，會被視為是合理可接受的，女性則要忍受丈夫不平等的對待，女性如果反抗則會遭到指責和批評。



由上述可知，在父權社會的建構下，這些價值觀和制度深刻烙印在「男性」和「女性」的社會角色中，屬於支配地位的男性角色擁有更多的權力和資源，屬於從屬地位的女性角色則缺乏資源和被剝奪基本權利，促使性別群體間的權力差異擴大，最後導致在婚姻體系內，性別間的階級差異不僅持續存在，也持續增強和拉大差距。

## （二）家庭地位和家務分工

在異性戀婚姻中，社會性別文化對性別角色的期望之一是女性有義務擔任家務服務與家庭照顧的主要角色（黃惠君，2012；戴世攻，2016）。東亞傳統儒家文化與父權主義奠定了臺灣的性別角色背景，形成「男性在外養家糊口，女性在家庭領域努力」的分工模式（Gu, 2019; Qian & Sayer, 2016; Tan, 2022）。

《禮記·內則篇》記載了家庭內各種關係間的禮儀，「男不言內，女不言外」即是夫婦有別的體現（張思嘉等人，2018；黃光國，1995），從上述可見傳統價值觀認為女性應負責家務，而男性以在外的工作為主，長此以往，形成性別角色模式不斷複製的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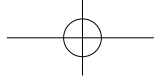
個人在社會化過程塑造的性別角色態度是決定家務分工的主要因素（呂玉瑕、伊慶春，2005），當性別刻板印象愈高，愈強調傳統性別角色的分工模式（藍玉玲、林烘煜，2018）。受社會主流價值觀影響，「男主外，女主內」的角色規範制度促使女性執行符合「家庭主婦」此角色的行為，而男性則認定自己的責任為全心投入職場工作，在家中處於支配位置使男性的性別角色比女性更趨於保守與傳統（呂玉瑕，1995），甚至將從事家務視為羞恥及違和的，因為擔心被旁人知曉使家族丟了面子（Gu, 2019），如同社會支配論所提及之制度

社會化及差別報酬的概念。

過往文獻對於家務分工常以「相對權力理論」進行探討（呂玉瑕、伊慶春，2005；蔡明璋，2004），認為家務分工是夫妻間資源的交換，由於家務是一種缺乏報酬的工作，比起另一半在外工作獲得的經濟收入，家務常被歸於對社會無貢獻的職業，使妻子對丈夫有經濟依賴的需求而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也因此認同自己的在家中的從屬地位，如此循環往復，使得不平等的責任與分工變得更加牢固，即使社會性別階層結構有所鬆動，但傳統性別規範仍持續影響家庭內夫妻分工及權力關係（呂玉瑕、伊慶春，2005）。

## 二、性傾向的權力壓迫

現今社會的性傾向仍然以異性戀為主，異性戀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自然法則，非異性戀者被認為是「不正常」或「病態」，亦即所謂的「異性戀霸權」或是異性戀主義（heterosexism），這讓社會大眾更忽略了非異性戀者的親密關係經驗及其相關權利（游美惠，2009）。當一個人還沒「出櫃」時，常常被預設為異性戀者，男人與女人會有親密關係、建立家庭被認為理所當然，因為社會傳統、經濟安排與法律結構，都把異性伴侶當作唯一且極為重要的社會單位（游美惠，2015）。異性戀社會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夠以異性戀的生活方式為主，這使得同性戀者在認同自己的性傾向時，必須要改變許多的人生觀（駱俊宏等人，2005）。異性戀常規化（heteronormativity）即是一種異性戀社會透過支配而形成的現象，是指一套鞏固性別規範、異性戀以及傳統家庭價值的意識形態，將異性戀視為自然且優於



所有其他性傾向，甚至視其為人類唯一正確的生活方式（劉安真，2017；Robinson, 2016）。異性戀群體透過合法化迷思的途徑，強制將性別的概念、想法和行為聯繫在一起，且被視為是社會和文化的一個基礎結構（Herz & Johansson, 2015）。異性戀常規化的其中一個向度為獨尊異性戀，意即認定異性戀是唯一正常的性傾向，病理化性少數族群，以達到推崇異性戀，貶抑其他性傾向的效果。

### 三、社會中的職業階級

職業結構是社會階級的核心概念，用以衡量個人及家庭生活物質水平與社會地位等，因此階級相同的群體通常具有相似的生活風格，並擁有同等的資源及機會（Jarman et al., 2021）。《管子·小匡》中提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從春秋時代開始，社會已經將職業進行區分，當時的社會環境職業通常是世襲（斯波義信、林秀薇，2018），此種制度將職業階級明顯劃分開來。俗話說「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更是將知識分子視為職業階級中的頂端，突顯不同職業之間階級的差距。

職業帶來的榮譽和聲望，形成高低社會階級（顏姿吟、連廷嘉，2020），使得個人在抉擇職涯方向時，仍不免對於職業帶來的利弊進行比較，例如大多數人認為從事醫生、律師相關行業是位在社會階級的頂端，此種觀點反映出人們對職業有著共同印象（images of occupations），包含對職業工作內容、工作條件和報酬以及人與工作的適配度等，而人們通常選擇與自己社會地位、知識水準及性別相符的職業（劉賢文，2015），從社會支配論的角度，個體亦

會選擇與個人社會支配傾向相符合的工作。以性別而言，多數男性在階級強化的角色與機構中佔主導地位，並且由於男性的社會支配傾向程度普遍高於女性（Pratto et al., 2006），更易選擇階級強化制度的工作以符合自身，像是警察、軍人、企業高層管理者等，而多數女性以階級削弱的角色為主，像是教師、社會工作者等（Pratto et al., 2006），這樣的機制同時也強化了社會中的制度歧視以及性別刻板印象，使人們更加難以跳脫框架。

除了上述提及會鞏固職業階級的因素外，家庭傳承帶來的影響也不可忽視，家庭上一代會重現且傳遞他們從原生家庭習得的信念、價值觀、行為模式與情感互動經驗給下一代（顏姿吟、連廷嘉，2020），這當中不僅是社會對職業的態度，雙親社會階級不同，伴隨著不同的價值觀，並透過教養的方式傳遞給子女，也使階級更可能在家庭中被複製，進而鞏固社會階級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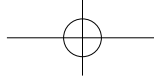
## 肆、以社會支配論分析《日常對話》紀錄片

### 一、性別

社會與個體之間如何交互作用而持續鞏固主流意識，甚至拉大了支配群體與從屬群體之間的權力差距，這也是壓迫之所以持續存在的原因，從「日常對話」中不難發現人們這些看似「日常」的話語與行為，層層揭開了性別與婚姻當中的權力議題與壓迫的面貌。

#### （一）婚姻制度

紀錄片的主角一月女因為和當時的現任女友吵架，因此匆忙的和一名男子結婚，她在經歷認知失調後，認同父權



的意識形態，並調整自己的社會支配傾向，做出符合角色期待的行為（Radke et al., 2018）。紀錄片中導演的舅舅曾提及：「男大當婚，女大當嫁。」諸如此類的話語其實透露出成年的女性必須履行「嫁人」的義務；舅舅在祭祖時也提到過：「女性本身在過世後不會被家族所供奉，更遑論未出嫁的女性。」這類的習俗也印證了女性即便累積成就或是為家族貢獻，最後也只能仰賴婚姻進入夫家的體系，如此一來他的存在才能被看見。這樣的概念透過制度社會化代代相傳，因此「生為夫家人，死為夫家鬼」的邏輯，讓女性幾乎沒有離開婚姻與家庭的權力（賴文珍，2012）。

父權制度以男性為中心的意識形態，闡述男性在社會中享有權力、特權的狀態，且通常比起女性及兒童有更高的權威（Adisa et al., 2019; Becker, 1999; Dobash & Dobash, 1979; Kalabamu, 2006）。

紀錄片中呈現姨婆、月女及惠偵忙著在偌大的廚房空間烹飪，同時鏡頭也帶到舅舅們從後方的樓梯離開廚房的身影。女性從事家務，負責洗衣煮飯，而男性僅經過廚房沒有任何停留，看似理所當然，可能男性「根本沒有想過自己應該投入並協助家務」或「認為自己不需要從事家務」，這些自然而然的態度，都是內化了性別角色的呈現，也是制度社會化的結果，亦為父權社會的縮影。

## （二）婚姻和家庭暴力

在紀錄片中，月女在面對丈夫對她的暴力相向時，表現的是接受和服從的反應，並無任何抵抗或反擊的行為，最後因為忍受不了長期的暴力和丈夫嗜賭成癮，因此選擇帶兩個女兒逃離家中，但卻因為認為「遭受到暴力是丟臉的事情」，並未告訴其他人或是尋求相關協助；而丈夫的暴力行為並非侷限於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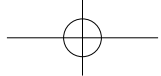
的妻子，也要求女兒惠偵用手或嘴巴接觸自己的生殖器。

由紀錄片的內容可以看見，月女所處的社會環境強調「男尊女卑」的價值觀，促使女性在家中的地位遠低於男性，當男性對女性出現肢體或情緒暴力時，會被認為是維護家庭地位的一種合理性行為，而女性為了維護家庭和諧，需要忍讓男性的暴力對待（彭思萍，2014），加上「家醜不可外揚」的價值觀，更使女性擔心讓娘家或夫家蒙羞，選擇不求助或不離婚作為解決問題的手段（Shen, 2010）。男性和女性在婚姻及家庭中的社會角色期待以及社會地位不同，讓婚姻暴力成為一種合理的存在，重複和維持著性別階級差異。

## 二、性傾向的權力壓迫

我們處在唯一認同異性戀和以異性戀為中心的社會中，沒有人會質疑異性戀的合理合法性，反之，同性戀被視為「變態」或「偏差」（成令方，2004）。母親月女之前的伴侶表示，在與母親交往以前，覺得自己是「正常的」女生；而也可以從導演在自白提到，她打從有記憶開始，就知道媽媽月女喜歡女生，直到有一位長輩告訴她這叫同性戀，是變態的、不正常的；導演黃惠偵訪問親戚們是否知道母親的同性戀身分，舅舅回答：「這我就知道了，知道這些又沒有用。」姨婆則以簡單的「這我不知道，我要去洗衣服了。」上述對話反映母親月女的親友對於她是同性戀的這一個事實，雖然沒有直接的言語攻擊或批判，但身為高社會支配傾向的異性戀群體，他們在談及同性戀的話題時，是相當不自在的。

女兒惠偵詢問母親為何不與自己談



論關於同性戀及伴侶的議題時，母親表示：「你們還小，跟你們說這個做什麼？」最後月女才脫口而出：「我不想說那些，說那些對你們不好。」可以看見母親月女內化了主流異性戀群體所共享的社會價值與態度，將負面訊息及標籤應用到自己身上。這種因異性戀常規化想法的強化以及異性戀群體積極或消極的壓迫，影響了母親月女對於自己的認知，影片中女兒問：「你覺得世界上有人了解你嗎？」母親僅簡短地回應：「不知道，有誰要了解我。」語氣透露出深深的無奈。由此可見，在異性戀霸權的脈絡之下，同性戀群體無法受到與異性戀同等的待遇，性少數群體們往往被邊緣化，這些來自外部系統的壓迫，無可避免的可能會使被壓迫者內化負面的訊息。

### 三、社會中的職業階級

紀錄片中月女與兩個女兒一起從事「牽亡」的工作來維生，紀錄片中所指「牽亡」為「牽亡歌陣」，除了超渡亡魂之外，亦有寬慰家屬對往生者思念之功能，但卻經常被認為是低俗殯葬文化（龔萬侯，2005）。臺灣社會長久以來對喪葬、死亡等相關事物有諸多禁忌，而牽亡歌陣是喪葬陣頭，民間頗為忌諱，認為從事牽亡有損形象，由此可以看出社會對此職業的態度，導演黃惠偵即自述因為「牽亡」這份工作被同儕嘲笑的經歷，再加上現代多斥之為迷信或是認為其噪音擾人、浪費金錢（龔萬侯，2008），導致人們誤解並將其歸為低階的社會階級，而持續劃分高低社會階級地位的結果，使得階級位置更不易被改變。

紀錄片中，從月女到導演黃惠偵的

妹妹，再到導演黃惠偵的姪女，皆從事牽亡這份工作，從中可以看到世代傳承現象，反映出職業階級的複製，雙親的價值觀傳遞給下一代，當子女認同時，進而成為子女自身的價值觀。在《日常對話》中，月女認可自己處於從屬位置，在家庭的影響下使得牽亡這個職業傳承下去，突顯出階級較難流動的困境，也因此更加鞏固社會階級制度。

### 四、日常生活中的多元交織性

多元交織性的概念較為抽象，是指個體處在社會中擁有許多身分，個體同時會受到諸多變項的影響，例如種族、性傾向、年齡等（沈慶鴻、趙祥和，2021）。無論是強調男尊女卑社會中的女性、異性戀常規化中的同性戀群體或是從事「大眾認為晦氣」的牽亡工作，月女皆處在從屬地位中，這些經驗交織成複雜的壓迫面貌。

導演黃惠偵在榕樹下的自白：「令人怨恨的是，媽媽愛她的伴侶比愛我們更多」。在拍攝紀錄片以前，母女之間在日常生活中是無法建立起對話的。這可能是因為月女時常不在家，除了維持生計這個原因之外，其實也包含了月女將自己從家庭生活當中抽離此因素，致使女兒在家庭系統中沒有機會獲得支持，甚至看著母親如何真誠地對待伴侶，心中萌生了不公平的念想。藉由女兒打破長久以來的沉默，詢問母親怎麼從來沒有提過伴侶或是同性戀的事情，而月女回答：「我不想說那些，說那些對你們不好。」月女可能認為自己沒有價值以及擔心女兒接受到「負面的訊息」，甚至不清楚該如何帶著同性戀的身分與女兒相處，而決定自己默默逃開，轉而投入經營個人的生活與情感；女兒則是



認為自己沒有獲得公平的機會得到月女的愛，不解與失望地走遠。

個體出生後便會在家庭的教養下形成價值觀與道德判斷，並對性少數族群產生負向／不符合主流的文化價值觀感（鄭穎澤，2015），個體的價值觀也會逐漸被影響（趙奕霽，2014）。導演黃惠偵在十幾歲時，被親戚告知自己的母親是同性戀，是變態的、不正常的之後，便開始感到怨恨，覺得自己的媽媽和其他人不一樣，也怨恨自己是變態生的小孩。當女兒詢問母親世上有沒有了解她的人，月女回答：「不知道，誰要了解我」。在「反同價值觀」的影響下，導演黃惠偵對自身所屬群體產生負向感，並進一步影響其自我評價，形成自我削弱（沈慶鴻、趙祥和，2021），月女在受壓迫的影響下，也漸漸地封閉起了自己。

在紀錄片中所呈現的母女對話，其中有一段是導演黃惠偵向母親表達當年遭到父親性侵時，對於母親知情卻將他安排在父親房間感到不理解和氣憤，但母親表示自己不知道這件事。以社會支配論的角度而言，父親在家中屬於支配的地位，擁有相對較高的權力，且時常會對月女施以暴力以及侵犯女兒，但女兒和月女同樣身為從屬地位的女性，對反抗高地位者無能為力，因此導演黃惠偵將原本對高地位父親的生氣和恐懼轉移到母親身上。

綜上所述可見，月女與導演黃惠偵的母女關係是社會壓迫下的產物，壓迫不僅從外向內地影響個人，如同月女內化社會主流價值觀帶來的壓迫，個體在內化壓迫的同時，也由內而外對其人際關係以及個人的系統帶來影響。從社會壓迫的角度而言，月女與導演黃惠偵的互動不只停留在母女關係的相處，它也代表著個人多元身分與另一個人多元身

分的互動（Dhananjaya, 2022），雙方可能各自兼具壓迫與受壓迫的身分，例如同為女性，又或是分別身為同性戀與異性戀，不同壓迫角色的互動形成紀錄片中所看到的母女關係。

日常對話反映出社會的樣貌，透過紀錄片中各個角色的語言、行為及互動可以看見社會支配的概念深刻鑲嵌在其中。受到社會制度與個體交互作用的影響，月女對性別、性傾向及工作階級的刻板印象逐漸形成，同時也建構出月女自身低社會支配傾向，使其扮演與自身社會支配傾向相符的社會角色，進而左右其後續各個生活層面的選擇，完成階級複製並使得主流意識更加牢固。

## 伍、社會支配論與日常對話對輔導諮商實務的啟發

本文除了分析《日常對話》中的壓迫議題之外，也說明了壓迫對於主角月女的影響。Sue和Sue（2015）即指出壓迫是多元文化諮商的重要內涵，個體無論是性別或性傾向中的少數族群，都會在生命中遭受系統中帶來的壓迫，這也是主要威脅其心理健康的因素（劉安真，2017）。因此，助人工作者在幫助受到系統壓迫的個體時，多元文化能力的裝備是不可或缺的，其重要性在於關注個體所處社會脈絡造成的影響，以利提供其適當的協助（劉安真，2006）。

從社會支配理論來看，多元文化能力的培養不只侷限於新知識與技能的學習，更需要嘗試反學習（unlearn），解構在社會化過程中習得的關於鞏固系統壓迫的問題性態度與信念，不僅要知曉社會中的壓迫是如何運作與不運作外，也要覺察特權的存在以及更鉅觀地看待個案的議題（Lantz et al., 2020）。反學習的概念含納了多元文化能力取向



(multicultural orientation, MCO) 中文化謙遜 (cultural humility) 的意涵，是一種內在削弱階級的方式，了解自身能力的限制與具備開放性的態度，才能以個體身處的文化脈絡分析其議題 (Davis et al., 2018; Hook et al., 2013; Lantz et al., 2020)

。相關研究也發現社會支配傾向分別與同理及多元文化能力 (包含知識與意識) 呈負相關，且特權的覺察能顯著預測多元文化能力 (Lantz et al., 2020; Nicol & Rounding, 2013; Wilcox et al., 2020)，當助人者對於特權與階級制度無法保持敏銳的覺察，可能妨礙我們對於文化和社會、政治影響力的理解，並對個案的議題做過多的內在歸因，而在無意間傷害個案。Lantz 等人 (2020) 亦提及，若不同時了解人們如何從不平等的系統獲益並犧牲他人 (也就是理解特權的本質)，以及不平等之所以存在並非是特定團體的劣勢所致，而是起因於資源不平等的壓迫，那麼對於壓迫的知識是不完整的 (McIntosh, 2012)。《日常對話》中壓迫的多元交織性，提醒著助人者在和當事人互動的同時，要將視框放大、放遠，對於系統的影響力保持敏感度，且除了精進多元文化諮商的專業知能之外，更要持續為遭受邊緣化的族群爭取權益，挑戰主流文化價值觀 (張曉佩, 2013)。

除了個人的覺察與反學習之外，助人領域也需創造開放、接納的環境，確保個體裝備完整的多元文化能力。相關研究顯示多元文化訓練可以促進多元文化能力並且減少偏見態度 (張曉佩、李宜蓉, 2018; Jaladin, 2017; Hall & Theriot, 2016; Jones et al., 2016; Pieterse et al., 2009; Spanierman et al., 2008)，助人專業需納入多元文化的培訓計畫，利用

制度社會化等機制，讓助人者遵循有助於削弱階級的系統性制度，降低實務工作者與潛在助人者的社會支配傾向，建立行動與理論知識，並提升其對於特權與壓迫的覺察 (孫頌賢等人, 2018; Lantz et al., 2020)。

本文受到紀錄片《日常對話》以及社會支配論的啟發，首先呈現社會支配論的核心概念與論述社會支配論如何透過性別、性傾向與職業階級對人們進行支配與壓迫，隨後以紀錄片各個角色的生活經驗為例，說明社會支配在生活中的體現，最後反思輔導諮商助人者裝備多元文化視框與能力的必要性與可行策略，希冀能幫助輔導諮商助人者直視與解構日常生活中的壓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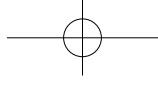
## 參考文獻

- \*Ciwang Teyra、黃炤愷、Lahok Ciwko (2022)。我不夠格嗎？都市原住民青年內外交困的歧視處境。*中華心理衛生學刊*, 35 (3), 249-274。  
。 [https://doi.org/10.30074/FJMH.202209\\_35\(3\).0002](https://doi.org/10.30074/FJMH.202209_35(3).0002)
- 成令方 (2004)。都是異性戀父權惹的禍！。*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27, 131-139。  
<http://lingfang.dlearn.kmu.edu.tw/feeling/love.pdf>
- 江寶釵、羅德仁 (2019)。原住民學研究理論之商榷：從後殖民理論到華語語系的思考。*臺灣文學學報*, 35, 159-192。  
[https://doi.org/10.30381/BTL.201912\\_\(35\).0006](https://doi.org/10.30381/BTL.201912_(35).0006)
- 呂玉瑕 (1995)。社會學與性別研究。*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3, 177-192。  
。 <https://doi.org/10.6352/mhwomen.199508.0177>
- 呂玉瑕、伊慶春 (2005)。社會變遷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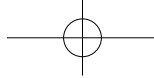
\*尊重作者名字以羅馬拼音呈現，因為此文獻為中文文獻，所以置於中文參考文獻之頂。



- 的夫妻資源與家務分工：台灣七〇年代與九〇年代社會文化脈絡的比較。《台灣社會學》，**10**，41-94。https://doi.org/10.6676/TS.2005.10.41
- 沈慶鴻、趙祥和（2021）。社區諮商－社會正義與系統合作取向。心理出版社。
- 孫頌賢、劉淑慧、王智弘、夏允中（2018）。證據導向實踐的諮商專業發展。《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52**，1-18。https://doi.org/10.3966/172851862018080052001
- 張思嘉、許詩淇、李惟新（2018）。「新好男人」，「新好女人」？當代華人婚姻關係中的角色義務。《本土心理學研究》，**50**，209-261。https://doi.org/10.6254/IPRCS.201812\_(50).0005
- 張晉芬（2011）。性別社會學。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https://www.ios.sinica.edu.tw/people/personal/ccf/P\_C\_2002.pdf
- 張曉佩（2013）。倡導：心理諮商的新趨勢。《輔導季刊》，**49**（3），35-44。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19966822-201309-201312170030-201312170030-36-44
- 張曉佩、李宜蓉（2018）。多元性別議題諮商能力：訓練方案對知識、覺察與技能影響之研究。《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52**，51-80。https://doi.org/10.3966/172851862018080052003
- 彭思萍（2014）。台灣社會婚姻制度與性別權力關係之解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 斯波義信、林秀薇（2018）。中國史上商人的社會地位。《漢學研究通訊》，**37**（4），9-14。http://ccsdb.ncl.edu.tw/ccs/image/02\_037\_004\_01\_03.pdf
- 游美惠（2009）。異性戀常規。《性別平等教育季刊》，**45**，98-101。http://lawdata.com.tw/tw/detail.aspx?no=381906
- 游美惠（2015）。「異性戀霸權」是什麼？。《巷仔口社會學》。https://twstreetcorner.org/2015/02/03/youmeihui/
- 黃光國（1995）。儒家價值觀的現代轉化：理論分析與實徵研究。《本土心理學研究》，**3**，276-338。https://doi.org/10.6254/1995.3.276
- 黃惠君（2012）。婚姻之路－影響東亞女性婚姻抉擇因素之探討〔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 趙奕霽（2014）。同性戀族群自我分化程度、內化恐同傾向與憂鬱症狀之探索性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 劉安真（2006）。諮商師訓練的新挑戰－論多元文化諮商能力與訓練。《弘光人文社會學報》，**4**，167-185。https://doi.org/10.29933/SHSS.200605.0009
- 劉安真（2017）。同志伴侶關係與諮商。《輔導與諮商學報》，**39**（1），19-38。http://agc.ncue.edu.tw/text39.1-2.pdf
- 劉賢文（2015）。職業結構－以關係結構探索職業的流動性特徵〔未出版之博士論文〕。輔仁大學心理學系。
- 劉鶴群、林鈺縈、張玉龍（2021）。變遷中的母系社會與移居都市地區阿美族女性家庭照顧者之照顧樣態。《社會發展研究學刊》，**27**，1-29。https://doi.org/10.6687/JS DS.202103\_(27).0001



- 蔡明璋 (2004)。台灣夫妻的家務工作時間：親密關係的影響。《台灣社會學》，8，99-131。https://doi.org/10.6676/TS.2004.8.99
- 鄭穎澤 (2015)。內化異性戀主義、工作場域之性傾向管理策略、憂鬱、會支持之關聯：調節中介效果之驗證〔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 賴文珍 (2012)。受暴女性經驗家之研究〔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
- 駱俊宏、林燕卿、王素女、林蕙瑛 (2005)。從異性戀霸權、父權體制觀看同性戀者之處境與污名。《台灣性學學刊》，11 (2)，61-74。https://doi.org/10.6784/FJS.200509.0061
- 戴世玫 (2016)。臺灣婚姻暴力圖像：從父權家族系統受暴網的觀點出發。《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20 (2)，43-82。https://doi.org/10.6785/SPSW.201612\_20(2).0002
- 藍玉玲、林烘煜 (2018)。家事分工性別化內隱與外顯測驗發展之初探研究。《教育心理學報》，50 (2)，189-217。https://doi.org/10.6251/BEP.201812\_50(2).0002
- 顏姿吟、連廷嘉 (2020)。臺灣醫師世家的生涯代間傳遞。《教育心理學報》，52 (2)，287-310。https://doi.org/10.6251/BEP.202012\_52(2).0003
- 龔萬侯 (2005)。牽亡歌陣儀式意涵之探討—以台南地區為例〔未出版碩士論文〕。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
- 龔萬侯 (2008)。牽亡歌陣的悲傷輔導效果之探討。《生死學研究》，8，99-136。https://doi.org/10.29844/JLDS.200807.0003
- Adisa, T. A., Cooke, F. L., & Iwowo, V. (2019). Mind your attitude: the impact of patriarchy on women's workplace behaviour. *Career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25(2), 146-164. https://doi.org/10.1108/CDI-07-2019-0183
- Jaladin, R. A. M. (2017). Perceived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competence of Malaysian counselors: An exploratory study.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45(2), 127-148. https://doi.org/10.1002/jmcd.12069
- Becker, M. (1999). Patriarchy and inequality: Towards a substantive feminism. *U. Chi. Legal F.*, 21-88. https://chicagounbound.uchicago.edu/uclf/vol1999/iss1/3
- Davis, D. E., DeBlaere, C., Owen, J., Hook, J. N., Rivera, D. P., Choe, E., Van Tongeren, D. R., Worthington, E. L., Jr., & Placeres, V. (2018). The multicultural orientation framework: A narrative review. *Psychotherapy*, 55(1), 89-100. https://doi.org/10.1037/pst0000160
- Dhananjaya, D. (2022). We are the oppressor and the oppressed: The interplay between intrapsychic, interpersonal, and societal intersectionality. *Transactional Analysis Journal*, 52(3), 244-258. https://doi.org/10.1080/03621537.2022.2082031
- Dobash, R. E., & Dobash, R. (1979). *Violence against wives: A case against the patriarchy*. Free Press.
- Gu, C. J. (2019). Bargaining with Confucian patriarchy: Money, culture, and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in Taiwanese immigrant families. *Qualitative Sociology*, 42(4), 687-709. https://doi.org/10.1007/s11133-019-09427-x
- Hall, J. C., & Theriot, M. T. (2016). Developing multicultural awareness, knowledge, and skills: Diversity



- training makes a difference?.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s*, 18(1), 35-41. <https://doi.org/10.1080/15210960.2016.1125742>
- Herz, M., & Johansson, T. (2015). The normativity of the concept of heteronormativity.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62(8), 1009-1020. <https://doi.org/10.1080/00918369.2015.1021631>
- Hook, J. N., Davis, D. E., Owen, J., Worthington, E. L., Jr., & Utsey, S. O. (2013). Cultural humility: Measuring openness to culturally diverse client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60(3), 353-366. <https://doi.org/10.1037/a0032595>
- Jarman, J., Lambert, P., & Penn, R. (2021). Social stratifica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 16(3), 271-279. <https://doi.org/10.1080/19359705.2012.711552>
- Jones, J. M., Kawena Begay, K., Nakagawa, Y., Cevalco, M., & Sit, J. (2016).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competence training: Adding value with multicultural consultatio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Consultation*, 26(3), 241-265. <https://doi.org/10.1080/10474412.2015.1012671>
- Kalabamu, F. (2006). Patriarchy and women's land rights in Botswana. *Land Use Policy*, 23(3), 237-246. <https://doi.org/10.1016/j.landusepol.2004.11.001>
- Lantz, M. M., Pieterse, A. L., & Taylor, T. O. (2020). A social dominance theory perspective on multicultural competence. *Counselling Psychology Quarterly*, 33(2), 142-162. <https://doi.org/10.1080/09515070.2018.1500352>
- McIntosh, P. (2012). Reflect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for privilege studie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8(1), 194-206. <https://doi.org/10.1111/j.1540-4560.2011.01744.x>
- Nicol, A. A., & Rounding, K. (2013). Alienation and empathy as mediator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R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 and expressions of racism and sexism.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5(3), 294-299.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3.03.009>
- Pieterse, A. L., Evans, S. A., Risner-Butner, A., Collins, N. M., & Mason, L. B. (2009). Multicultural competence and social justice training in counseling psychology and counselor education: A review and analysis of a sample of multicultural course syllabi.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37(1), 93-115. <https://doi.org/10.1177/0011000008319986>
- Pratto, F., Sidanius, J., & Levin, S. (2006). Social dominance theory and the dynamics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Taking stock and looking forward.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17(1), 271-320. <https://doi.org/10.1080/10463280601055772>
- Qian, Y., & Sayer, L. C. (2016). Division of labor, gender ideology,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in East Asia.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8(2), 383-400. <https://doi.org/10.1111/jomf.12274>
- Radke, H. R. M., Hornsey, M. J., Sibley, C. G., & Barlow, F. K. (2018). Negotiating the hierarchy: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among women is associated with the endorsement of benevolent sexism. *Austral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70, 158-166. <https://doi.org/10.1111/ajpy.12176>



- Robinson, B. A. (2016). Heteronormativity and homonormativity. *The Wiley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Gender and Sexuality Studies*, 1-3. <https://doi.org/10.1002/9781118663219.WBEGSS013>
- Schmitt, M. T. & Wirth, J. H. (2009). Evidence that Gender Differences in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Result from Gendered Self-Stereotyping and Group-Interested Responses to Patriarchy.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33(4), 429-436. <https://doi.org/10.1111/j.1471-6402.2009.01520.x>
- Shen, A. C. T. (2010). Cultural barriers to help-seeking among Taiwanese female victims of dating violence.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6(7), 1343-1365.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510369130>
- Sidanius, J., Cotterill, S., Sheehy-Skeffington, J., Kteily, N., & Carvacho, H. (2017). Social dominance theory: Explorations in the psychology of oppression. In C. G. Sibley & F. K. Barlow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the psychology of prejudice* (pp. 149-18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9781316161579.008>
- Sidanius, J., Pratto, F., & Bobo, L. (1996). Racism, conservatism, affirmative action, and intellectual sophistication: A matter of principled conservatism or group domina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0(3), 476.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70.3.476>
- Sidanius, J., Pratto, F., Van Laar, C., & Levin, S. (2004). Social dominance theory: Its agenda and method. *Political Psychology*, 25(6), 845-880. <https://doi.org/10.1111/j.1467-9221.2004.00401.x>
- Smith, E. A., Hill, K., Marlowe, F. W., Nolin, D., Wiessner, P., Gurven, M., & Bell, A. (2010). Wealth transmission and inequality among hunter-gatherers. *Current Anthropology*, 51(1), 19-34. <https://www.journals.uchicago.edu/doi/10.1086/648530>
- Spanierman, L. B., Poteat, V. P., Wang, Y. F., & Oh, E. (2008). Psychosocial costs of racism to white counselors: Predicting various dimensions of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competence.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55(1), 75-88. <https://doi.org/10.1037/0022-0167.55.1.75>
- Sue, D. W., & Sue, D. (2015). *Counseling the Culturally Diverse: Theory and Practice* (7th ed.). Wiley.
- Tan, J. (2022). Couples' division of labor and fertility in Taiwan.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1-29. <https://doi.org/10.1080/21620555.2022.2084066>
- Wilcox, M. M., Franks, D. N., Taylor, T. O., Monceaux, C. P., & Harris, K. (2020). Who's multiculturally competent? Everybody and nobody: A multimethod examination.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48(4), 466-497. <https://doi.org/10.1177/0011000020904709>
- Winterhalder, B., Kennett, D. J., Grote, M. N., & Bartruff, J. (2010). Ideal free settlement of California's northern Channel Islands.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29(4), 469-490. <https://doi.org/10.1016/j.jaa.2010.07.001>

投稿日期：2022年11月03日

通過日期：2023年02月06日